

## “无论好坏，都构成现在的我”：五位太阳花学运参与者的十年转瞬

“318是超出当时社会的事，它是社会运动，也不只是社会运动。”



(左起) 吴易澄、黄燕茹、杨子瑄、魏扬、许恩恩、摄：陈焯辉/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萧函青 发自台北

刊登于 2024-03-13

[# 太阳花运动 # 占领立法院 # 魏扬 # 太阳花学运 # 三一八学运 # 运动创伤](#)



【编者按】2014年3月18日，一群不满前日国民党立委张庆忠以30秒通过“两岸服贸协议”的学生及公民团体，以占领立法院的方式瘫痪议事、并表达退回服贸的诉求。自18日起，至4月10日结束，为期24日的公民运动，台湾社会受到剧烈地摇晃，那股街头对峙的余热，在那年的青年身上留下如纹身般的记忆。

须臾之间，十年一晃，当年的运动者有著截然不同的际遇，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这场运动，亦难以透过几个标签定性：有人说它是一场沿著反中情绪而来的运动，也有人说这是一场对于自由贸易将冲击贫富差距以及环境保育发出的警钟。

正因为怀抱著各自歧异的诉求与目的，也让这场运动的群众面目各异且鲜明，就连如何命名运动，在台湾社会也因著各式的运动经验以及行动逻辑，而有不同的命名方式。就参与者而言，有人称这是一场学运，但在参与者众下，这同时也是一场公民运动；有人以冲进立法院的当日——3月18日——作为运动名称；而见诸媒体版面与浮现大众视野的，则经常以太阳花学运称之。而这起初是来自一名花店老板送太阳花到现场支持学生的举动；此后，太阳花遂成为这场运动广为人知的符号。

一念之变，十年之途，台湾政治版块面临重组洗牌，公民社会的兴起、茁壮与健步迈前，持续在后太阳花时期吹拂著台湾社会。如果记忆有效期，十年之后，你还记得哪些？如果必须带著记忆生活，参与者又如何与记忆共处？端传媒将自3月13日起，刊载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系列文章及特制页面，向著记忆的碎片发出回声。

以2014年3月18日抗争者冲进立法院为座标的那日，到4月10日退场为止，为期24日的太阳花学运（亦称318学运、反黑箱服贸占领立法院行动）剧烈冲击台湾社会，并为群众运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如今刻度将跨越十年。十年的跨距，在浩瀚星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在人类有限的光谱中，却足以留下物换星移的印痕。端传媒深入访谈五位在运动中或远或近的参与者，邀请他们探索记忆虫洞，描绘彼时通往此刻的轨迹。

有人只是外围的声援者，却因为一首歌留下创伤。有人被迫指挥现场，却难以控制事态发展，进而陷入官司缠讼。但也有人在庶务中发展出互助的同侪情谊，有人在冗长的会议中习得某种生存技能，有人则是在场外打造了挑战权威的电音基地，实践公社精神。

这五篇生命故事，依照参与者的相对位置排序，包含他们于距离占领现场的地理空间，还有人际关系的社会空间；描绘心灵地景的距离宛如地图，让我们得以在错综复杂的历史现场，循线探查他们个人的行动抉择以及自我定位。

透过他们的故事，我们可以重新理解这场运动之于台湾社会的意义，它与中国因素高度相关，但没有停留在民族主义的情绪动员；它承载了台湾公民运动前几年的能量，包含工运、环运、居住权的倡议，以及马政府时期越演越烈的抗中行动，但却从旧有的网络中绽放出全新的群众动能。我们看到被称为“冲组”的当代青年行动者，在一波波抗争中被磨练得刚强，面对分歧时也烦恼挣扎，又如何带著伤痕仍需前行。

转瞬十年仿佛须臾之间，那场运动后，他们开展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当时的经验无论好坏，都构成他们在各自领域往下走的养份。

如同受访者许恩恩所述：“318是超出当时社会的事，它是社会运动，也不只是社会运动。”在那短短24日，台湾社会被卷动／召唤／激发出来的丰沛能量，远远超过当时的想像。现在我们想邀请读者一起，透过他们从跨越时空和人我之际折射出来的记忆碎片，一窥十年路径间，个体生命和集体历史交织的光影。



精神科医师吴易澄。摄：陈焯辉/端传媒

## 吴易澄，当时36岁，精神科医师，外围声援者

那一夜，打开我对苦难的想像。

我是医生，2013年看到[大埔张药房强拆事件](#)的冲击，改编了一首歌，变得好像明星一样，到处被邀请上台唱歌。反服贸运动在3月23日占领行政院那一晚，我也在现场唱歌。但我很少告诉别人，我后来不知道该怎么谈这首歌了。作为处理创伤的专家，这首歌却成为我的创伤。

我在彰化出生长大，父亲也是精神科医师，从小我就对医疗不陌生，但在当医师前，影响我更多的是大学学运社团，学长姐带我们参加罢工、接触各种议题。

在318运动之前，发生很多社会事件，包含大埔张药房强拆、苑里反风车、反媒体垄断……当时我在念清大人类所，很多学生也积极参与，所以我自然而然跟著朋友一起关心。我在医疗工作是处理比较后端，当人的受苦已经变成病痛的问题，但关心社会议题让我发现，其实人的受苦是在很前端的“社会结构”。

当时的社会气氛你会觉得，好像真的应该说些或做点什么。我很喜欢音乐，也很喜欢《悲惨世界》那首歌，我想：“如果用台语唱应该会很有感觉！”所以我把它改编成台语版。

3月18日他们冲进议场以后，里面有人来问我：“可不可以进去带大家唱歌？”那些年我被邀请去很多社运场合唱歌，已经有点疲惫了。我想我何德何能，对于服贸经济民主的论述，我也不是最清楚的人。但很多朋友都在运动中，后来我被说服了。

3月23日当天，我到了济南路他们搭的台子上。一面唱歌，一面就听到不远处传来喧哗声。当天主持人是林世裕先生，他马上宣布：“先中断一下！”他告诉大家，因为行政院有发生一些事情，有没有人可以去行政院支援？但也需要有人留在济南路，必须有人手牵手，把立法院的门挡著，免得立法院里面的警察冲出来。后来募集到一些人，整完队之后，他们就带队过去。

当时感受有点复杂，只是我还在台上，好像也必须鼓舞大家，所以我就还是继续唱。唱完我就搭车回新竹了，所以后续的情况我不清楚。但回新竹以后，睡一觉醒来，却发现同学被打，还被打得很惨。

看到新闻时，我整个人非常崩溃。我问我自己，我昨天晚上在干嘛？我昨天晚上在唱一首歌叫大家去被打！当天我走在路上，也有经过中正一分局、也看到警备车、也看到里面有警察。但再怎么样，我也没想到后来会这样……。



2014年3月23日，台北，防暴警察在行政院外与学生示威者发生冲突。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我到现在还在接受精神分析的治疗，也过了很久，我才能好好讲这件事。即便我只是一个过水的人，我并不是直接在行政院前面被打的人，而且我在台上被大家鼓掌，可是那也是一种伤，那是一种幸存者的亏欠。

这种感觉我没跟人家讲过，这是我的创伤，很深很深，我甚至失去一部分记忆。那几天我帮诗人朋友李长青写过一篇书序，后来我却完全忘记我做过这件事。我才意识到这真的是一个“伤”，我的大脑把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潜抑（repress）掉了。

回新竹后还是陆续有人问我：“吴医师，你可不可以去跟同学讲一下怎么面对心理创伤？”但我要说的是，没人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创伤啊！创伤本来就复杂，而且当下很多人还处在结构性的痛苦和暴力中。

这些过程让我更深刻思考，什么叫做心理创伤？到现在，我只要看到有人在社会事件随便把 PTSD 拿出来讲，我都觉得没那么简单。运动伤害并不是扁平单一的，每个人所经历的时空脉络有不同的轴线。也没有文献告诉我们什么是运动伤害，加害者也不一定是政府。有些人是面对警察，有人是在组织中的不信任，可能是各种煎熬，或是跟家庭关系的撕裂。

我也有进去会场，因为有医师很热心组织大家排班，只是比较像稳定军心，因为你也不可能在那里干嘛。在那个当下，是一个集体无助的状态，专业工作者并没有多高明。

我后来访谈了很多当时在第一线的人，有些人在场边开了小团体，透过诉说来彼此支持。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反而是我这个临床医师，仿佛是协助大家处理创伤的专家，在真正遇到时，我根本不知所措。因为治疗者要很清楚要治疗什么，但政治暴力不是专业工作者坐在诊间里就能清楚的。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318前，苗栗苑里居民为了阻挡风机公司在他们村落里面盖基地，他们组成自救会，24小时轮班在那边挡。地方政府也派警察去殴打他们，他们被围起来打，也很惨烈，只是没有像318变成头条新闻被大家看到。

在3月24日行政院流血冲突事件后，苑里乡亲虽然还在抗争，但他们组队到台北声援学生。我看见他们拉了一张布条，上面写：“互相来疗伤”。我很震撼，也很感动，这就是一种能动性，甚至那意义大过于一个精神医疗专业工作者可以提供的东西。

十年后回顾，如果精神科医师处理的是人的苦难，这过程也打开了我对苦难的想像。而实际上经历政治暴力的人，也实践了一种互相疗愈的行动能力，在运动中受伤的人，也可以是治疗者。这就是那场运动给我的反思。

曾在场外发起贱民解放区的杨子瑄。摄：陈焯焯/端传媒

**杨子瑄，当时24岁，咖啡店店长，在场外发起贱民解放区**

我想要的社群，是不会压迫彼此的。

今日，我们这些仿佛被工具化来守护立院议场，却被排挤在决策参与外的行动者——以济南路上的台大校友会馆及公厕之间的空间作为聚集地，正式成立“贱民解放区”。——节录自《贱民解放区宣言》

3月23日晚上，我和朋友守在立院外当纠察队，稳住动荡的群众，也怕警察趁机闯进去。后来局面稳定了，我朋友火车说：“在外面守这么多天，真的好想进去议场看一下长什么样子喔！”我们就决定去参观，结果发现要爬上城墙、又规定很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很像在进京面圣。幸好我们有认识守城门的人，可以快速通关。

进去以后就发现，哇，真的是皇城，物资超多，比如说橘子就会有人剥好放在那里，还有真正穿白袍的医生说“我帮你量个体温”，服务非常周到。当时我们在外面露宿很多天了，连便当都没拿到过。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同一场运动里面，他们是皇民，我们是贱民。

我从2008年开始参与社会运动，那是一场跟中国因素有关的大型集会，被称为“野草莓运动”，很多人在自由广场静坐。当时我在念东吴大学社会系，每天在广场找人聊天，我好奇大家来参加的动机，我会问：“你为什么会在哪里？”也问“有没有想一起干嘛？”但当时野草莓就有一些奇怪的排除，包含拉出封锁线，把学生跟其他人隔开。这种排除也跟我想的运动不同。

后来野草莓退场了，我们几个广场认识的人不想散掉，决定用公社的方式开一家店——直走咖啡。那时有十几、二十人一起决定事情，小到怎么打扫，大到为什么要有这家店。开店之后就很不想去学校，以前念社会系是想改变社会，但学校提供的是书上的解释，上课变成非常痛苦和无聊的事，反而在店里，很多 NGO 会来办活动，我们也号召大家投入反核，这家店变成我实践的场域，也是当年台北运动圈的基地。

但后来邻居觉得太吵，房东不续约，大家都有点内挫。结束营业后，我到处打工，参与剧场，用小卡车在反核游行放电音。我还是关心社会，但那两年陷入一种卡关的状态。3月17日当天，反核电音阵线在小地方开会，有人突然说：“反服贸的人闯进去了！要不要过去？”

2014年3月24日，台北，学生示威者占领立法院。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占领立法院让大家很雀跃，我心想：“赞欸！那我们进去立法院放歌！”但去了以后，发现没有本来想的那么简单，有朋友劝我们不要放电音，因为顾虑观感问题。我们后来拉去外面台大校友会馆的阶梯放歌，那一区人越聚越多，多半是想做点什么，但被议场“弹”出来的人。比如说有人想冲八巷（编按：即立法院外道路林森南路八巷，警方可从此巷通往立法院镇江街侧门），把警察全面赶出去。我也还是想做电音，因为电音有一种调性，可以打开那个场子，让人变得比较松，就可以开始谈话。

我们也曾試著跟议场内的决策者沟通，他们能不能理解外面有很多动力，像高压锅快炸掉了？大家已经不想坐在那里听演讲，当没有面貌的群众了。在3月18日到3月23日之间，外面的冲突张力是很高的，多路人马都在酝酿想干嘛。但当我们这边还在整合时，行政院那边的压力锅就爆炸了。

23日当晚非常混乱，警察持续清场，很多人去了行政院。我们这群相对有运动经验的人，决定留守现场，意外成为当晚的总纠察，这位置让我发现有超多不同纠察的复杂系统，消息杂乱。整晚我们就是在街头不断筛选资讯，还要稳定群众，帮大家做一些组训，被警察抬时要怎么作之类的。

一整夜后，随著行政院的人被警察击溃，士气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最鸡巴是立法院那边的态度是切割的。我开始觉得：“这一切真的是狗屎！”在那当下，我和我的朋友决定以后也不用顾虑议场了，我们要做自己的运动。

隔天我们重新回到一开始放电音的地方，大家聚在一起交换昨晚行政院发生的事，有一些新面孔加入，很多人第一次被警察暴力对待，大家都吓到。但即使有运动经验的人，被打到这强度也是不常见。

后来又发现外面抗争者跟议场内的差别待遇，我们觉得自己这区可以叫“贱民解放区”，因为我们驻扎在公厕旁。后来有人认真起草了贱民的宣言，有人挂起布条。有人进行论坛，但你听一听，不认同就可以去拿麦克风，任何人都可以发言。就这样，从互相疗伤开始，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们的社群慢慢诞生。

318退场后，贱民的社群也不想散掉，正好我稍早答应朋友的邀约，在台大附近开了“半路咖啡”，大家就继续聚在这里维持关系。我们分很多小组，比如说有一组叫“穷人生活地图”，轮流去不同的成员家煮饭吃。当你进去别人的套房或雅房，你会更理解在台北租房的贫穷青年。还有一组是郭家颖医师带大家谈各自生命跟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也有邀请香港安那其（编按：anarchism 中译，无政府主义）和左翼社群的伙伴来交流，他们在旺角煮火锅跟打乒乓球，做一些比较生活化或有趣的事，就被现场群众或是网民大力指责，说他们破坏运动，或说他们只是来玩的，跟我们面临到的处境有点像。

这十年来社会运动越来越少。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街头现场，跟我们的生命经验差异很大。但我在意的还是社群，而且是有抵抗的社群，我们一起煮饭吃，节省开销，也组织到一票伙伴。我们不直接做任何议题，但我们在做的，我觉得还是社会运动。

当年卡住的我，318让我重新找到了对社群的想像。回顾当年对抗的事情，我更清楚了，我想要的社群，是彼此是不压迫彼此的。

曾在议场内担任秘书组的许恩恩。摄：陈焯辉/端传媒

## 许恩恩，当时21岁，大学生，在议场内担任秘书组

“对话”本身就是意义。

我的工作专门帮别人“开会”——设计会议、工作坊，再引导大家讨论。但如果没有318的经验，我不会长出这种能力。因为我人生开过最可怕的会，就是当年在立法院里讨论“退场”的会。

那真是个 nightmare，好像永远不会结束。有天晚上我还梦到我在议场面，拿著小白板，在写隔天的 run down。

我在高雄出生长大，18岁之后才来台北，念台北大学社会系，加入学运社团“翻墙社”，2014年3月18日，刚好是翻墙社社课，应该是探讨土地议题，所以晚上社课完，有人滑脸书，说“立法院外面的群众要冲了！”我们就一群人浩浩荡荡，从三峡搭著台北客运去声援。

那里人潮汹涌，我从长老教会爬楼梯进去，济南路群众正在推门，停车场那边也传来消息说想要冲，声东击西，真的非常混乱，我也不能保证自己记得的版本，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

我跟著人潮进到议场，一开始很兴奋：“耶！占下来了！”但大家都抱持著一种几小时后要被清场的心情。第一次身处立法院的空间，感觉很新鲜，现场有些人一直拿麦克风咆哮，指挥大家守这边守那边。

第二天，吕家华来找我，我们在青年运动者培力交流《庶人之乱》一起合作过，她说暂时不会被清场，既然占领了这里，要不要找点事情做？她跟一些学者和 NGO 伙伴想透过一些设计带议场里的人讨论议题，他们觉得我很适合加入。

我答应帮忙，这样的活动需要很多桌长来带小组讨论，我就出去外面找其他学生。直到4月10日退场前，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有时我纪录，有时我主持，请大家讲话，再抛出问题“这要怎么执行？”或“有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每天都睡在议场地板上，睡醒就是开会。洗头可以在二楼厕所洗手台弯腰洗，有发型师来修剪，食物也很多，三明治、排骨便当，什么都不缺。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出去，外面济南路 NGO 棚子，我也没有熟到可以加入，学校也停课了。所以就算出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议场已经成为我新的人际圈，虽然我社团朋友大部分都在社科院那边，但因为324行政院流血事件很多人受伤，团体之间互相猜疑，我作为“里面”的人就不好意思过去，也怕自己白目说错什么。

可能我也很需要分散注意力，318前一年，我处在一段很不稳定的亲密关系中，当时的男朋友在某次争吵后，对我动粗。我逃离了那段关系，却面临要不要提告的挣扎。我记得318那段时间，刚好是告诉期六个月的届满，我告诉自己，我放弃提告是因为投身这场运动更重要，但我可能是在逃避。也幸好忙这些，才不会那么痛苦。

2014年3月27日，台北，学生示威者继续占领立法院。摄：Lam Yik Fei/Getty Images

3月30日应该是一个转折点，那是动员的最高峰，4月慢慢开始走向下坡，在议场里面确实出现了疲累的气氛，开始讨论“退场”。

关于退场的会议很冗长，因为参与者边界很松，只要有轮值的人都可以讲话，很多人不满，他们觉得怎么莫名其妙退场了？不管是守著门的、还是守著二楼的，他们说：“为什么我们明明在这里，却是不在这里的人决定这里要退？”

有人提出要全国公投，有人说要让外面的人民一起来决定、还有人说要做剧场收尾……等等，而我就是一直拿个白板站在那里，纪录、整理这些意见。虽然很多意见不可行，因为大家都很崩溃，讲出来的话都很激动。中间我还喊暂停，大家需要冷静一下。

后来还是退场了。每组人对退场都有自己的仪式，比如说二楼的人就决定要从他们的天梯那里退。我则是回到学校、念了研究所，毕业后曾在唐凤办公室工作（编按：唐凤为现任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后来跟前同事一起出来开了一个小工作室，帮人“开会”。

这确实是我在议场学到的技能，而且是以前没有想过的技能。318之前，没发现开会如此重要，因为其他抗争不会这么长时间共处一个封闭空间、跟异质性这么高的一群人进行这么大量的讨论。那时才会被迫思考，人们怎么讨论事情？局限在哪里？

所以十年后回看，318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是野外求生，也是开会大赛、开会马拉松，是超现实的、我人生不会再发生一次的事情，是超出社会的事，是社会运动，但也不只是社会运动。整体来说，这十年我过得比上个十年快乐。

后来我主持了很多场共识营，最后通常都没有共识，但即使如此，有几小时，让大家说出一些话，你就可以了解别人、了解自己。我发现我喜欢看到这个过程，如果本来对话的品质是10分、20分，透过一些设计，不可能到满分，但以让对话提升50到60分之间。如果有冲突，就爆发出来，总是有方法处理的。

这就是我在议场里面学到的，“对话”本身就是意义，而不是产生的结论才有意义，开会的重点就是要“让大家好好讲话”，不要把别人排除在外。



## 魏扬，当时24岁，研究生，担任行政院占领现场指挥



2014年3月23日晚上，我从新竹要搭车回台北，原本要回占领立法院的现场，但听说行政院也有行动，客运下车后就立刻赶去行政院，当时里里外外，人已经超级多，还有人不断要从大门或是围墙翻进去。

进去却发现没有什么熟面孔，大家互不相识，也没有很明确的指挥体系，现场一团混乱。我看到有人拿麦克风，就上前问：“要不要帮忙？”他说：“太好了！”马上把麦克风给我。

我所处的位置，是行政院大门前面的广场，但围绕行政院的几个门，也都塞满了群众。我整晚拿著麦克风，忙著处理各种消息，比如说有人受伤了，就要问：“现场有没有医师？”有媒体距离太近，跟群众冲突，就要呼吁大家保持距离。还有爸爸妈妈来到现场说：“我的小孩有没有在这里？他还是高中生！”我们就要帮他协寻。

刚进来时很兴奋，虽然这不是我发起的，但大家真的满了不起的，占领立法院之后又占领了行政院，感觉运动很有希望。那时，我还没想到后面会发生的事。

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算是愤青，不像陈为廷（编按：太阳花学运领袖之一）高中就会参加社运，我的兴趣是写小说、写剧本，我本来有推甄台大戏剧系，只是后来没上，但我的梦想是当作家。后来在清大搞社团，我的参与也不是第一线，比较是写论述，打笔战的脚色。

但后来到了2013年，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爽已经到了极致。发生了苗栗大埔两次强拆，**洪仲丘事件**，全国关厂工人连线也卧轨抗争。那一年大家都在多头作战，我们虽然在清大，也越来越常去参加校外的社运冲场，只是要搭末班车回新竹。

所以服贸对我来说，也只是很多议题当中的一个。

直到某天，当时负责串联的台大历史博士生周馥仪问我，可否去赖中强律师抗议服贸的活动当纠察？那时我也不清楚服贸是什么，还去找郝明义（编按：台湾出版人）的文章来看。那年代，我们讲“纠察”，意思就是要跟警察推挤。立法院抗争也差不多那样，就是在中山南路集合，讲几句话，摇一下栅栏，翻进去躺在地上，然后警察就会说：“好啦，同学可以了。”就请你出去，这就是一个 Pattern。

先是在3月17日发生张庆忠的30秒事件（编按：指国民党立委张庆忠透过自备的无线麦克风，以30秒的时间通过服贸协议），大家决定要再冲一场，有小道消息说18日当天警力好像会比较薄弱，所以我们规划了一个“三面进攻”。济南路就是主舞台，再请台派去撞一下康园（编按：康园位处济南路上，为国会餐厅）的铁门，应该可以吸引一些警力，这时候社运干部就从青岛东路快速冲进去。虽然这样规划，也没想过会成功。

当时我跟曾柏瑜（编按：曾于2022年11月递补上新北市议员）在济南路舞台上当主持人，我们一边推挤啊，喊啊喊的，突然听到“有人进去了！”大家就士气大振，还在观望的人就一拥而上，后来就是势如破竹，意外地占领了议场。所以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这就是历史吧，机缘巧合就发生了。

占领后我也去里面看了一下，大家都很开心，混乱中我还把手机弄不见了，要跟别人借手机传讯息给我爸妈。到了18日早上，议场跟警察对峙的关系就僵持下来，没有太多变化。

但场外的群众一直很躁动，大家不知道这场运动下一步要走去哪？所以社科院的干部，也包含我，还把林飞帆、陈为廷从议场里面叫出来，进行了冗长的讨论，问他们到底要不要进一步行动？不然我们自己动也可以。

中间我回了新竹一趟，准备发表 STS 年会。结束后，回家喂了猫，再搭车北上。当时我已经听说有人准备要冲一波。客运开到台北时，看网路才发现行政院已经被占领了。



到了行政院广场上，混乱中我拿起麦克风主持，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安抚大家，因为很多人还想往里面冲，但我觉得很危险，又不确定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中间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有来现场，我有犹豫，还是让他们讲话，因为当时已经传出要清场的风声，我本来期待他们可以吓阻一些警察的镇压。

果然到了午夜，警察就开始驱离，他们从北平东路那一侧开始。有人跑来广场回报，说警察会直接用槌子捶你，不然就是用盾牌刹你的脚，或是把你拉进去盾牌之后，人就不见了。

一直听到这些消息，我好几次跑去北平东路，试图劝退大家，我大声疾呼：“我们是非暴力抗争，如果警察攻击，大家可以退回到行政院中央的广场！”

但我每次讲完，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起来撤退，大家都很悲愤坐著，很坚定地看著他们的伙伴被拖到盾牌后面消失。我只好回去广场，改成募集安全帽：“现在如果有人手上有安全帽的，我们就送到前面去！”现在想想也没什么用，也是杯水车薪。整晚疲于奔命，还是难以力挽狂澜。

后来中山北路那侧，也开始有警察把防线往内推，镇暴水车也从那边开过来。没过多久，我的麦克风也没电了，只能改用大声公，不停对大家喊话，不久后大声公也没电了。警察慢慢逼近，他们已经把北平东路清掉了，逼到了广场中间。我默默看著魔幻写实的这一切，水一直在喷，警察一直在打人。我甚至跟我旁边的伙伴说：“我决定了，今天之后我就要退出社运。”因为这场面实在太震撼了。

突然有两三个全身黑衣黑帽、俗称黑龟的镇暴警察，一拥而上，直接把我压在地上，反手扣在背后，用膝盖压著背，把我上铐。

我心想：“大势已去。”但我还是想要个嘴皮子，看警匪片不是都会宣读权利吗，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就跟压住我的警察说：“我的权利呢！”他也愣住，回呛我：“你现在不配拥有权利啦！”

我被压在地上，听著警察整齐画一的脚步声，还有他们喊：“整－队！”的口号，搭配咚咚咚的脚步声，由远到近，听著整个广场从原本很吵杂，后来只剩下警察整队的声音，最后趋于寂静。

后来我被抓到保安大队，顾立雄和尤伯祥律师来帮我。检察官没办法证明我有预谋，最后我被无保请回。但为了避免被抗告，我还是先回到新竹避风头。我情绪上也想休息一下，因为行政院那晚发生的事情，搞得我对大家的信任度有点低——立法院里的人第一时间是切割，所以我很不爽。

我对社科院也不爽，快被驱离前，我接到那边打来的电话，叫我把现场的群众撤回立法院。但我光是去劝群众撤退到广场他们都不愿意，何况是叫大家离开，我又不是在玩世纪帝国那种模拟战略游戏，滑鼠滑一滑人就会动。

在318结束后，生活很忙碌，很多年轻人加入，黑岛青变得很大。我们后续还发动很多行动，但我怕大家变成无脑冲组，便试著带读书会，应该是说我一厢情愿地希望大家读些政治经济的书。

但后来成效不佳，我只好接受现况，虽然一开始是对中国不满才吸引到这么多人，但大家也不是对于这些论述很有兴趣才加入我们，很多人当初踏入运动走上街头，都是向往那种血气方刚的冲撞。

我常在想，从大学弄基进笔记，后来弄黑岛青，我总是被推到位置上，不论是社长、主编或总召，都没有很成功，总觉得自己组织做失败，但我也没看到组织真的做得很好的人或团体，是不是这本来就很难？因为做组织很累，你又要对人的状态很敏锐，我不擅长这个，他们吵架也好，或是路线问题，或是他们动力很低，我都觉得好烦。

后来我离开了组织，出国念书又回来，一边帮环境 NGO 工作，一边念博班，这选择可能也跟年纪有关，至少不用再处理人的问题，真是太好了。现在上了年纪有点社交恐惧，我也一直希望自己有更多时间，好好把一些问题想清楚。

回看这十年，如果要比较，我还是会喜欢做研究的自己多一点，但运动也有很多让人慷慨激昂、肾上腺素爆发的时候，我也怀念这样子的自己。这可能是三十几岁的我，对二十几岁的自己一种缅怀的滤镜。那些熬夜开会，在街头刮风下雨、大声疾呼的感觉真的满好的。事后回想，当时喊的东西很多都站不住脚。但我想，就是那股素朴的情感、那股激动愤怒的感觉，如此深刻，并让人成瘾。其实研究和运动都很像是鸦片，都有让人著迷的地方。

318打乱了我人生的规划，但我也从来不会后悔当时做了这些事吧！因为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如果没经过这些事情，无论是好的坏的，我也无法想像自己会变成甚么样子。



## 黄燕茹，当时26岁，研究生，议场纠察组组长

如果我再坚强一点，是不是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声音？

318运动，我在立法院24天，担任纠察组长，很多人说我是警总，但他们没办法看到我在保护什么。其实我也太晚才发现，真正该保护的是什么。

我在高雄左营的一个眷村长大，大家后来都说我是冲组，但念社工系的我是个书呆子，因为我需要奖学金，所以大学四年就是疯狂念书，我要求自己平均成绩要85分以上，每科课本都会念三次，也几乎不缺席任何一堂课。后来考上辅大社工所，我才到北部生活，但人生地不熟，生活变得更封闭。

有一次我学妹李佳庭约我出去，她告诉我现在在外面学运正夯，她很兴奋：“那两个带头的陈为廷、林飞帆很萌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BL 之爱！”我就被她约去济南路看 BL，当时是媒体并购案要送去公平委员会，公民团体大动员，结果我都到了，她却没来，我只好留在现场听演讲，听一听，事情好像有点严重，那我关注一下好了。隔几天我又去声援记者会，现场只有八个人，记者会结束后林飞帆就宣布：“我们回去开会！”我也莫名其妙跟去开会。

从那天起，我人生就整个歪掉，我自愿加入草根组，帮忙画图、做懒人包，串联组织，去校园宣讲。我还发现，原来这个社会的问题，比我想得更大，那是烽火连天的时代，有迫迁、劳权的抗争，还有土地正义的问题，每个团体最缺人手的时候就是跟警察对峙，愿意在前线冲撞的人很少，我是其中一个，所以还要到处跑去相挺别人。

很多人会关心我有没有运动伤害或暴力阴影，我是没有这一块，我的伤口都是皮肉伤，常常旧伤口没好，又有新伤口，手臂上也都是磨擦、破皮，我也没感觉害怕。从小我的原生家庭每天吵吵闹闹，父母间冲突的张力很高，所以我一直就很习惯空气中有压力的生活。再加上抗争现场就是任务取向，你没时间思考，只想达成目标。

后来社运越来越难，我们再怎么冲，现场都才五六十人。那时我的收入很惨淡，要参与社运，只能弹性打工，我到处借住朋友家，有一阵子还住在仓库，以定义上来说，那时我就是个街友。后来我加入了一个提供住宿的工运团体，当时已经搬去他们宿舍，准备要投入职场了。

但318爆发后，我很难不关心，对我来说，反服贸那些团体是我的娘家啊！大家又一直呼唤我，说需要冲撞的人，我忍不住跑去现场。进去以后，反而要先面对，这么多人怎么一起工作？有人要做资讯组，有人想当翻译，有人想修水电，有人可以去拉网路……我成名得比较早，大家都说：“我认识燕茹！”我就帮这些人协调、互相介绍，在现场你认识越多人，会越有话语权，最后我成了纠察组长。

占领前几天陷入僵局，因为江宜桦和马英九都不回应，或是回应得很糟，只会叫学生回家，后来外面就爆发了行政院的事情。纠察组就要关注警察动向，因为警察会挑衅，会突然逮捕学生，或是在交班时趁机扩张他们的领域，我们就要再把警察推回去。

除了突发状况，还有一堆庶务，我早上忙记者会，下午开联席会，发早餐午餐晚餐，还要把前一天决策小组开会的内容通知给80个组员，这就耗费了我一整天。除此之外，每天都会有新的人进来静坐，就要清点人数，还要资源回收、物资盘点、发工作证、如果有人遗失还要补发……每天都很多拉哩拉扎的事情。然后参与者对于占领行动也很焦虑，有人跟女朋友分手，有人跟家里吵架，有人赶不及考期中考被当又怎么办？我花很多时间听每个人说话。

有人说我在议场里面的权力很大，但信服我的人也很多，因为议场里的人对于决策小组完全不熟，我是他们唯一会看到的干部，其他学运明星都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但每天跟他们一起工作的，只有我。我也每天都在处理组员的心情，怕他们被决策小组甩出去，也不能让他们觉得被利用。

我记得有一天我昏倒了，昏倒前想的是：“千万不能被媒体拍到！”所以硬撑著走出议场门口才倒下。真的太累了，好险我没暴毙，但其他人都没发现，他们还以为我睡著。

2014年4月10日，台北，示威者列队离开立法院。摄：Pichi Chuang/Reuters/达志影像

但对我来说最辛苦的一刻，就是退场。很突然地我们就被告知，决策组已经决定了日期，我只能转身说服组员。但我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退场？我要怎么做到让每个人接受？有点像是公司倒闭，要关厂了，我是资方代表，只能宣布“上面”的决定。

一开始我的组员没人要退场，大家都很难接受。我们纠察组承受了运动的骂名，以前的朋友说我是警总，又说我们人身控管、排外、说我们军队，核心决策圈也对我不爽，觉得我意见太多。但到最后，这些付出，也没看到诉求达成，就跟我们说结束了。最后我们决定，既然这场运动不需要我们了，我们就提早离开。

其实也是在同一日的白天，4月10日，我从青岛东路侧门走出去的。我们是最后一批纠察，没有任何欢呼、感谢，也没有说再见。我们很像一群路人，就这样走了。晚上我回到借住的朋友家，在电视里面看著他们的退场晚会。

我回到日常生活，思考自己以后要干嘛，但我发现当时退场得太快，很多人无法适应，还是有5、600人在立法院周围游荡。我也担心我的组员，每天都会回去一下看看状况。后来我联络那些纠察组的，我说：“大家各带一道菜，我们来济南路上围炉吧！”这个一人一菜的聚餐维持了好几个月。

十年后的我，又回到了社工的位置。我曾在政党和国会工作几年，2022年工人作家林立青（编按：著有《做工的人》等畅销书）找我去他新创的“友洗”上班，这是一家由无家者组成，承揽洗地、清理遗屋、垃圾屋的社会企业。我除了在现场工作，每天还要帮街友申请社会福利，买日用品，带他们看医生。很多时间也要跟其他人沟通街友就业的状况，要解释“为什么给弱勢者好的设备，工作对他们来说还是那么困难？”几乎每一刻都在沟通，其实跟当年在议场里做的事，也很像。

回头看，318运动让我了解，反对的声音很重要。当年我听到很多不满我们作为的声音，我也很生气，我想“我这么累了，为什么没办法体谅我再多一点？”但是如果这场运动一定要有人做坏人，怎么有制度化地去把议场管理做得更包容一点？以前一起抗争的朋友，当他们对决策有质疑时，我可以怎么调整？可能当时我尽力了，但没有做好。

如果再来一次，如果我再坚强一点，是不是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声音？所谓的坚强不是强势，我希望有更多的能量，来捍卫当初跟我们不同的意见。我们太晚发现，要保护的不是决策小组，而是这场运动。

杨子瑄的咖啡店内，挂著昔日贱民解放区的照片。摄：陈焯燿/端传媒

[# 太阳花运动 # 占领立法院 # 魏扬 # 太阳花学运 # 三一八学运 # 运动创伤](#)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复制，否则即为侵权。

端傳媒的下一程，需要你的守護。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支持我們走下去，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點擊了解更多](#) [會員計畫](#)